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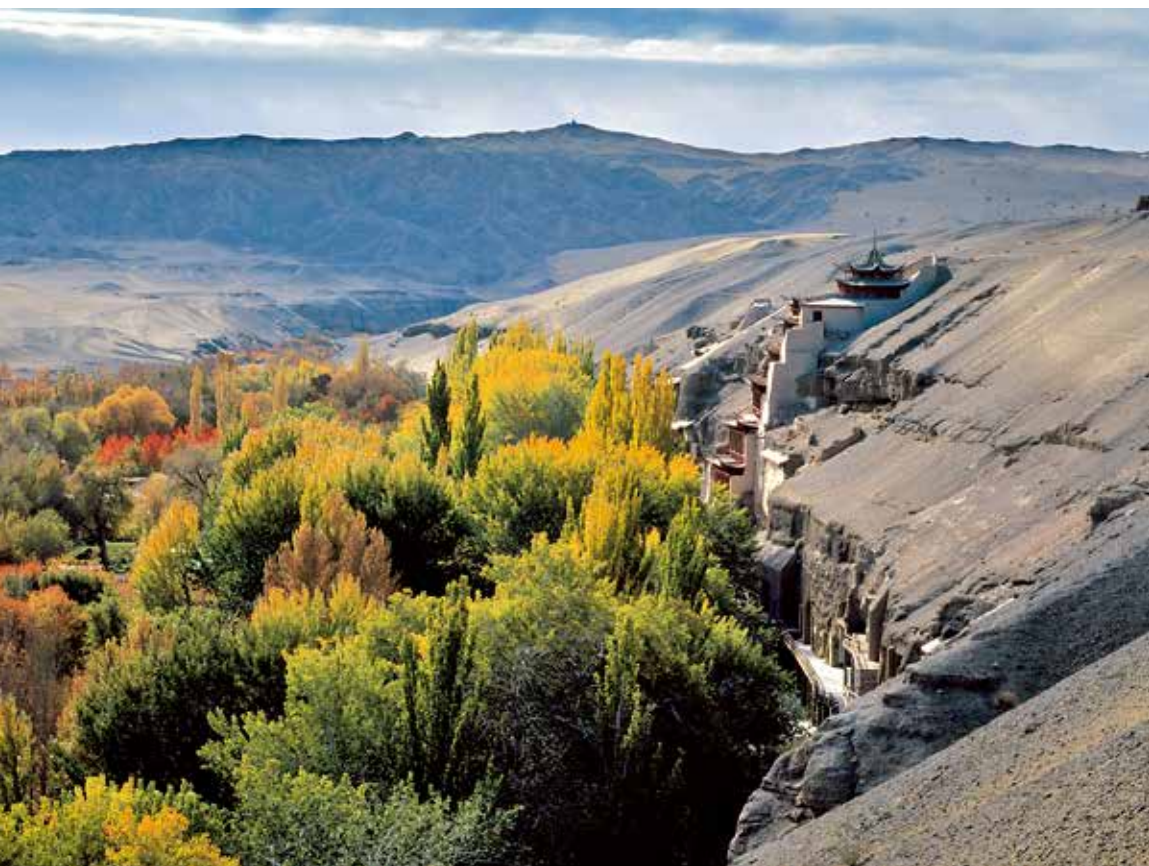
我心歸處是敦煌

樊錦詩自述

樊錦詩 口述

顧春芳 撰寫

中和出版
OPEN PACE
中



敦煌莫高窟外景

孫志軍 / 攝影



敦煌三危山
孫志軍 / 攝影



敦煌陽關烽燧
孫志軍 / 攝影



星空下的莫高窟前部分舍利塔

孫志軍 / 攝影



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群

孫志軍 / 攝影





莫高窟第 257 窟，《鹿王本生圖》部分（北魏）

孫志軍 / 攝影



莫高窟第259窟，禪定佛（北魏）

孫志軍 / 攝影



莫高窟第285窟，《伏羲女媧圖》（西魏）

孫志軍 / 攝影



莫高窟第217窟，《觀無量壽經變》（盛唐）

孫志軍 / 攝影



莫高窟第 130 窟，南大像（盛唐）

吴健 / 摄影

目 錄

繁體中文版前言 i

自 序 iii

第一章 人生的不確定性

初見人世 003

路有凍死骨 007

一個嶄新的上海 009

差一點死於小兒麻痺症 012

我的興趣所在 015

居里夫人的影響 016

別無選擇 017

第二章 神聖的大學

在北大歷史學系抄文稿 021

兼容並包的學術風氣 022

群星燦爛的歷史學系 026

回憶蘇秉琦先生 030

宿白先生的為人與為學 036

北大的精神傳統和學術氛圍 044

第三章 敦煌是我的宿命

- 幻想在現實中蘇醒 051
- 在莫高窟的畢業實習 053
- 「李廣杏」，如此人間好杏 055
- 我被分配去了敦煌 057
- 蘇秉琦先生的一次召見 059
- 重回莫高窟 061

第四章 千年莫高窟

- 石窟藝術聖地 069
- 樂傳和尚與敦煌第一窟 073
- 苦難孕育的燦爛文明 075
- 張議潮與歸義軍 080
- 藝術和文化是國家氣象的反映 081
- 藏經洞文書的發現與流散 083
- 藏經洞文書的價值 089

第五章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 敦煌學在海外 097
- 羅振玉、王國維與中國敦煌學的發軔 104
- 陳寅恪對中國敦煌學的貢獻 106
- 張大千和向達在敦煌 107

常書鴻先生與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	113
段文傑先生與敦煌研究院	118
季羨林先生與敦煌	122
潘重規、饒宗頤的敦煌情緣	125
為了敦煌學回歸中國	129
敦煌學的未來	132

第六章 風雨飄搖的日子

莫高窟人的宿命	137
父親的突然死亡帶來的傷痛	141
簡單相信，傻傻堅持	147
他們成了豬倌和羊倌	151
莫高窟沒有被破壞是個奇跡	157

第七章 敦煌的女兒

報告文學《敦煌的女兒》	165
從北大到敦煌	167
我其實想過離開敦煌	170
我不是好妻子、好母親	173
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185
老彭與莫高窟北區考古	194
花甲之後拚盡全力	201

我的老彭走了 206

第八章 敦煌石窟藝術

綿延千年的形象佛教史 215

有最早紀年題記的洞窟博物館 221

說不盡的經變畫 226

榆林窟的稀世神品 232

永不停息的自由飛舞 241

最完美的彩塑 244

第 158 窟：涅槃的境界 245

敦煌藝術與中原文化 251

臨摹需要達到無我之境 258

第九章 保護就是和時間賽跑

莫高窟保存面臨的風險 269

持之以恆的沙害治理 274

搶救和預防：保護工作的「二重奏」 275

壁畫修復的緩慢節奏 279

與蓋蒂的合作 282

《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的制定和出台 286

追憶平山先生 288

與時俱進的保護理念 293

「數字敦煌」的實現 299

第十章 永久保存，永續利用

莫高窟人的拓荒和堅守 317

「保護文物也是政績」 321

「申遺」成功給我的啟示 330

制定《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 337

按照《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的要求制定

《敦煌莫高窟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 341

莫高窟告急！ 347

耗資四億的數展中心 352

不能「武大郎開店」 366

科學保護讓敦煌永生 371

第十一章 春風化雨潤心田

拉開大規模搶救的帷幕 379

「敦煌的保護是件事，還是件大事！」 381

對保護和傳承文化遺產的關懷和重視 384

「做好新時代中華文化的繼承者、傳播者、創新者」 387

莫高窟保護，任重而道遠 393

第十二章 四十年後終成卷

- 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百年回望 399
- 《敦煌七講》：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建立 409
- 考證與分期 414
- 為了「還債」 422
- 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重要和困難 425
- 四十年終於完成《敦煌石窟全集》首卷 431
- 急功近利是學術的死敵 436

第十三章 莫高窟人和「莫高精神」

- 「捨身飼虎」的真意 443
- 「莫高精神」的傑出典範 448
- 我們都是敦煌這棵大樹上的枝葉 455
- 我沾了莫高窟的光 459
- 守護敦煌的究極意義 462
- 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 463

後 記 471

- 樊錦詩年表 490

繁體中文版前言

由我口述、北京大學顧春芳教授撰寫的《我心歸處是敦煌》於 2019 年 10 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後，受到了廣大讀者的喜愛，也得到了許多海內外關心和支持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和弘揚事業的朋友們的關心。

去年 10 月，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總經理陳翠玲女士聯繫我們，希望儘快出版繁體中文版，以便讓更多的香港及海外華人讀者和朋友了解敦煌石窟藝術和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深邃厚重；了解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薪火相傳，堅守大漠，為守護敦煌石窟所付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和無怨無悔的奉獻。衷心感謝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為該書在香港的出版所做的努力。

值此機會，我謹向多年來熱心關愛和慷慨支持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弘揚事業的各界香港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謝！特別要向饒宗頤先生及其親屬對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弘揚所作出的重大貢獻表示感謝！20 世紀 80 年代初，饒先生第一次來敦煌莫高窟，先生或流連於洞窟之中，或查閱經卷於研究所內，閒暇之餘，先生漫步於宕泉河畔，寄情於三危山峰。在離開莫高窟前，

饒先生萬分感慨，寫下了著名的《莫高窟題壁》：「河湟入夢若懸旌，鐵馬堅冰紙上鳴。石窟春風香柳綠，他生願作寫經生。」為支持敦煌研究院的數字化工程，饒先生為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捐資建造了一座小樓，取名饒宗頤樓。「饒宗頤樓」四個字就是他親自題寫的。巍峨的九層樓和古老的鳴沙山將永遠見證先生對敦煌石窟所傾注的厚愛，先生的無量功德，福利人天，也將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中。

我還要向慷慨支持改進敦煌石窟洞窟保護設施的邵逸夫先生及其親屬；向竭盡全力募集善款，積極支持敦煌石窟數字化檔案建設和石窟保護維修、培養敦煌人才和在香港地區推廣普及敦煌文化藝術的「香港敦煌之友」及其各位會員和各位大德；向積極傳播弘揚敦煌文化藝術的《敦煌石窟全集》(26卷)香港出版者；向為幫助敦煌莫高窟治理風沙，籌劃「香港敦煌佛跡防護功德林計劃」的覺光長老領銜的香港佛教聯合會等香港機構；向多次積極在香港舉辦敦煌石窟文化藝術展的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文化博物館、城市大學邵逸夫創意媒體學院、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致以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希望香港的讀者朋友們看了這本書之後，能夠愛上敦煌莫高窟。

樊錦詩

2020年5月12日於上海

自序

以往有不少記者採訪過我，寫過關於我的報道，也有不少人提出要為我寫傳記。我都不假思索，一一婉拒，我覺得自己沒甚麼可寫的。後來，我的一些同行、同事、朋友也希望我寫一部回憶錄，出版社和媒體的朋友也都主動約我寫口述歷史。於是我不得不認真考慮他們的建議。

我想，大家之所以反覆建議，是因為我是莫高窟發生巨變和敦煌研究院事業日新月異的親歷者、參與者和見證者。我今年八十一歲，已經在敦煌工作五十七年了。以我在敦煌近六十年的所見所聞，為莫高窟的保護事業，為敦煌研究院的發展留史、續史，是我不能推卸的責任。可是，我過去從未想過要寫自傳，上了年紀就更沒有精力去寫，真的要寫不知會寫到猴年馬月。

真是天意！2014年，北京大學有幾位教授來莫高窟考察，我和藝術學院的顧春芳老師一見如故。我翻閱過她的書和詩集，知道她主要從事美學、藝術學、戲劇學的教學和研究。古人說文如其人，她博學多才、能文能詩，學術造詣深厚，天賦悟性很高，治學嚴謹，才思敏捷，文字透出才氣和靈氣。之後通過幾次交流和接觸，對她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越發感到這是一位值得信賴

的學者，我們結下了真摯的友情。所以，當她說希望訪談我的時候，我欣然接受。

這本書的基礎是我們倆長達十天的訪談內容。因我特別信任她，訪談時完全處於放鬆狀態，問甚麼就說甚麼，敞開心扉毫無保留。北京和敦煌相隔遙遠，見面不容易，我就想利用有限的時間多提供給她一些材料。為了保證我所說的關於敦煌歷史、敦煌藝術、藏經洞文物、壁畫保護等內容的準確性，她後來又去查閱了大量敦煌學的論著、畫冊、文集，包括《敦煌研究》等文獻資料，下了極大的功夫。

顧老師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十分繁忙，她之前也並非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學者，為了這本書，她要補充敦煌學方方面面的材料，其難度和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有一回我到她的辦公室，看到了一大堆關於敦煌的書籍和資料，令我非常感動。當我看到顧老師撰寫完成的初稿時，我感到這本書已經大大超出了我最初的想像，令我既感到驚訝，又十分佩服。我覺得她很辛苦，我有責任配合她做好書稿的校對工作。

顧老師深知我與敦煌是不可分的，我一生的事業以及我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敦煌，寫樊錦詩這個人如果脫離了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而只是簡單重複網上多次發佈的那些報道，就寫不出一個真實而又完整的樊錦詩。為此，她設計了一個合理又系統的框架，深挖莫高窟的重要價值和敦煌研究院的重大事件，把我個人的命運同敦煌研究院的發展變化結合起來，把我個人和我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結合起來，把我對於文物保護事業的所思

所想真實地表達了出來，甚至說出了我想說而說不出的話。

這本自述的完成，要感謝顧老師，如果沒有她的出現，也許迄今為止我都未曾想過要寫一本關於我自己的書，也不可能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

捧起書稿，讓我無限感慨，許多往事歷歷在目。

回想 1962 年，我第一次到敦煌參加實習，好像就在昨天，可一晃我已經八十一歲了。我的身體每況愈下，思維和行動也越來越遲緩，我不知道自己還能陪伴莫高窟多長時間，還能為她做多少事情。我的記性大不如從前，很多事情都忘記了，但是我忘不了幾代國家領導人對莫高窟保護事業的關心；我忘不了那些北大的師長，北大的學習時光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忘不了以常書鴻、段文傑為代表的老一輩莫高窟人在大漠戈壁的艱難條件下筆路藍縷、含辛茹苦地開創了莫高窟保護、研究、弘揚的事業；我也忘不了許許多多國內外的機構和朋友的深情厚誼，他們一次次伸出援手，幫助和支持莫高窟的保護事業。在這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要感謝所有長期關心支持我的朋友們。

還要感謝我的家人，我的兩個孩子，感謝他們對我這個不稱職的母親的理解和寬容。希望他們讀了這本書之後，能夠更加懂得守護莫高窟是值得奉獻一生的高尚的事業，是必然要奉獻一生的艱苦的事業，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為之奉獻的永恆的事業。

特別要感謝我的同窗、我的終身伴侶彭金章。沒有老彭對我的愛和理解，就沒有今天的樊錦詩，我根本不可能在敦煌堅持下來，也不可能全心全意去做敦煌的工作。我一直想等退休之後陪

他到敦煌以外的地方走走看看。萬萬沒有想到，我甚麼都還沒有做，老彭卻離我而去，留給我無限的悲傷，無限的愧疚，無限的遺憾！現在，我時常覺得老彭沒有走，他還在我身旁，和我一起守護着莫高窟，他依然在支持我，給我力量！我們倆曾經的誓言是：「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們用愛和生命踐行了這樣一個神聖的誓言。

樊錦詩

2019年8月24日於敦煌

第一章 人生的不確定性





1957 年 7 月 2 日，樊錦詩（右）與樊錦書於上海合影

初見人世

我的祖籍是浙江杭州。1938年7月9日我出生於北平。

那年北平已經淪陷，日軍司令部就設在鐵獅子胡同。但是華北之大，日軍根本無法控制。日本政府決定「以華制華」，在佔領區扶植各種傀儡政權，以達成征服中國的目的。為了掠奪中國的資源，日軍接管並壟斷了華北的交通、郵電、鋼鐵、煤炭、電力和紡織等行業，還強行發行了聯銀券。華北的糧食、棉花等物資被運往日本，導致食品奇缺，物價飛漲。^{〔1〕}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們一家就去了上海。北平淪陷後，絕大多數北平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人士都拒絕與侵略者合作，寧願拋棄優越的生活條件，到大後方為抗戰盡力。由於種種原因走不了的，也寧可隱居起來，過着清貧的日子。在這種情況下，我父母決定帶着全家去南方謀生。

我出生的時候，家裡已經有了一個大姐，我和二姐是雙生子。按照家譜，我們姐妹是樊家的梅字輩，大姐的名字中就有個「梅」字。但是父親希望女孩子也要飽讀詩書，於是分別以「詩」「書」為名，給我們姐妹倆取了名字。我的雙胞胎姐姐叫「樊錦書」，我叫「樊錦詩」。

我是在協和醫院出生的。我和姐姐是早產兒，出生的時候才六個半月。聽祖母說，我們生下來的時候，大腿就只有她大拇

指那麼粗。由於我們嚴重不足月，醫院不讓出院，需要放在暖箱裡觀察。現在想想，如果不是在協和醫院，以當時一般的醫療條件，估計我們早就沒命了。

因為有兩個孩子，母親的奶水又不足，等我們出院的時候，她就雇了一個奶媽。姐姐由母親親自餵養，我就交給奶媽餵養。因為奶媽的奶水很好，很快我各方面的指標都超過了姐姐。過了一陣子，我們到協和醫院做檢查，醫生說這兩個小孩，怎麼一個胖一個瘦，是不是媽媽偏心。其實並非媽媽偏心，而是奶媽格外偏愛我，照顧我特別細心。

但我和姐姐畢竟是不足月的早產兒，又是雙生子，從小體質就比較弱。特別是我，小時候多病多災。因為先天不足，背也有點駝，就是一個「醜小鴨」。

我父親名叫樊際麟，他畢業於清華大學，是個工程師。

父親大學畢業後就在北平的工部局工作，後來我們舉家搬到南方，他一度改行經商。他的外語特別好，非常熱愛中國古典藝術和文化。因為我很小就離開了北平，因此對小時候在北平的那一段生活並沒有特別的印象。

南下上海之後，因為家裡孩子多，母親就在家操持家務，全家只有父親一個人工作。我們家本來已經有了三姐妹，後來又陸續有了兩個弟弟，一共姐弟五個。因為家裡還有爺爺奶奶，父母的負擔比較重。於是，母親把我和雙胞胎姐姐放在外婆家裡寄養，我們就和外婆住在上海愚園路的一幢公寓裡。外婆家的生活條件很好，她會做西餐，我很小就會吃西餐。



父親樊際麟



母親與大姐和小弟合影

父母帶着大姐和弟弟住在舅舅家一個石庫門的房子裡。那個房子位於現在的靜安區新閘路。後來我們全家又搬去了虹口區，租住在一個租界時期的西式房子裡，家裡還有壁爐。不過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全家人都從那裡給轟了出去。

老人的觀念比較陳舊，外婆總說女孩子唸甚麼書，將來能識字，能看丈夫的家信就行了。所以我弟弟六歲就能去讀書，而我和姐姐直到八歲才進正式的學堂。幸虧我父親沒有重男輕女的思想，他覺得女孩們也應該去上學，於是說服了外婆。正是由於父親，我才有機會進學校讀書。

我先後上過三個私立小學。我的第一個學校是愚園路的彼得小學，那是一個教會學校。二年級的時候我從彼得小學轉到了當時的求德小學，第二年又轉到了海寧路的善導小學。我們家有五個孩子，要供五個孩子讀書，父母的負擔可想而知。直到後來公私合營，中學都是公立學校，沒有私立學校了，這時候我才進了公立學校讀書。

每逢新學期開始，我和姐姐們領了新書回家後，父親總要和我們一起包書皮。那時候不像現在，有現成的漂亮包書紙。當時就是找些乾淨的牛皮紙，把課本的封面包上。之後，父親就會用楷書工工整整地在書封寫上「樊錦詩」三個字。父親練過書法，字寫得非常漂亮，他對孩子們也是言傳身教，從小要我們練書法。他還找來顏真卿、歐陽詢的字帖讓我們臨摹。我小時候也喜歡模仿父親的字，潛移默化地，我的字和他的很像。

受我父親的影響，我從小喜歡聽評彈、看戲，特別喜歡跟隨

家人去聽戲，因為到了戲院就可以吃到許多點心。我現在還喜歡評彈和崑曲，最喜歡聽劉天韻的《林沖踏雪》。

路有凍死骨

我從小目睹過甚麼是「十里洋場」，也目睹過城市貧民和無家可歸的流浪人群。抗戰期間，上海淪為「孤島」，市區絕大部分地方都是日軍侵佔的淪陷區，還有英法等其他國家控制的租界。大家都害怕日本人，有時候小孩子哭鬧，只要大人一說：「日本人來了！」小孩子連哭都不敢哭。所以我們小時候對日本人的恐懼是根深蒂固的。我記得每家每戶的玻璃窗上都貼着米字格紙條，怕轟炸聲把玻璃震碎了，我的印象中連窗簾都是黑的。

在我的記憶裡，大人們會給孩子們講文天祥、岳飛、戚繼光的故事，當時的兒童讀物主要是這樣一類鼓勵愛國的書，連積木上也印了這些個英雄人物。在父母和家人的呵護下，我們兄弟姐妹小時候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的印象中，父親還時常教我們背誦《古文觀止》，帶我們去看電影。靜安寺愚園路附近有一個百樂門影院，我就在那裡看過美國好萊塢電影《出水芙蓉》和《綠野仙蹤》，後來還看過蘇聯電影《第三次打擊》。

聽家裡人說，就在我出生那年的年初，也就是1938年1月，因為寒潮入襲上海，有上萬人被凍死、餓死。據說到了1939年，情況更加嚴峻，大多數市民的生活也變得格外艱難，原因是米價瘋漲。上海人主要的糧食是大米，由於通貨膨脹、籌備軍糧，還

有游資的囤積和政府的限價，導致了米荒。^{〔2〕}1949年前的上海街頭，經常有要飯的乞丐，我至今還記得在上學路上親眼看到過路邊餓死的難民。一天早上我看見有個經常在同一地點要飯的人，就倒在了那裡。很多乞丐都是從外省逃難來的。淮河地區經常鬧水災，安徽一帶的難民就逃難到上海來，但是在上海這樣的地方也沒有他們的生路。

那段時期還聽說了一件令我終生難忘的事情。上海米價瘋漲，買不到米，而對生了小孩的家庭來說，最好的營養品就是用大米熬的粥，普通市民都想盡辦法出去弄米。聽說，有一家的月婆子出去買米，可是出門後一連幾天也沒有回來。家人十分着急，以為她去鄉下甚麼地方買米了，但是沒想到其實是被日本人抓去了，從此再沒有了音訊。這實在是童年記憶中一件令我感到震驚、恐懼而難忘的事情。

還有一件令我無法忘懷的往事，就發生在我們和外婆居住的公寓樓裡。有一天晚上，我聽到外面有日本兵的叫喊聲和汽車聲，瞬間就感到特別恐懼。樓道裡非常吵鬧，大人說有日本兵正在搜查。這種吵鬧聲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來荷槍的日本兵從樓裡押着一批人往外走。透過門縫，我注意到被抓的全都是高鼻子的外國人。日本兵把他們塞到停在公寓門口的卡車裡，就揚長而去。我當時並不知道日本兵為甚麼要來公寓抓人，年幼的我不懂也不會問。很多年以後，我才明白過來。很可能是「珍珠港事件」以後，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向日本宣戰。那天晚上日本兵的突然襲擊，應該是來抓捕和我們住在一棟樓裡的美國人。

1945 年 8 月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這個消息傳來，上海各界組織了各種慶祝活動。那一刻，整個上海興奮得不得了！中國勝利了！上海人簡直高興得都狂熱了！我那時候已經七歲了。在這七年裡，我雖然年幼無知，但受到大人的影響，和所有人一樣有一種非常強烈的信念：「絕不當亡國奴！」現在敦煌研究院和日本方面合作的項目很多，我們也能合作得很好，有些日本學者確實非常熱愛敦煌藝術，也為莫高窟的保護做了很多切實的貢獻。但是我有時想起小時候的這些事情，還是覺得不能完全釋懷。

當然，這只是一個孩子當時的感受。如今回過頭來看，這種愛國的感情，和大人的教育是分不開的。我們當時看的書，看的圖片，聽的故事，雖然也有白雪公主、美人魚，但更多的是精忠報國、抗擊倭寇。這些教育對我影響至深。

一個嶄新的上海

新中國成立前的上海，物價飛漲。特別是 1947 年，上海出現糧食供應不足、米價飛漲的情況，一般市民無力購買，那一年的 5 月還出現了搶米的風潮。其他生活物品的價格也是瘋漲。據說 1949 年初天氣寒冷，但是煤運相繼斷絕，存戶居為奇貨。工廠囤積商品的現象也比較普遍，加之各種投機活動、特務活動和幫會活動，那時的上海比較混亂。

最嚴重的通貨膨脹發生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幾乎每個月物價都

第二章 神聖的大學





未名湖畔留影

在北大歷史學系抄文稿

我是一個人坐火車去北京大學報到的，那是 1958 年 9 月。

我坐的是慢車，從上海到北京要三天三夜。列車上的設備非常簡單，臥鋪就是木條凳，靠背很低，不是臥鋪的話，坐的地方連靠背都沒有。列車上沒有餐車，也沒有地方買吃的，出門的時候家人給我準備了乾糧和水。火車每到一個站，都要停很長時間。從窗戶望出去，覺得許多城市和上海比起來差距太大了。

我動身去北大報到前，並不知道那一年北大入學報到的時間推遲了。為了這件事，《人民日報》還特意登出了一個通告，但是我沒有看到，也沒有任何人告訴我。結果我到了北京火車站之後，發現既沒人接也沒人管。我感到很納悶，怎麼北京大學都沒有迎接新生的安排？只能自己想辦法摸到了北大。我記得找到了當時的 16 齋，準備辦理報到手續。但是人家說這裡不是報到的地方，讓我去 27 齋問問。結果 27 齋也根本沒有人辦理報到手續。

那怎麼辦？總不見得再回上海吧。我就一個人在燕園裡走走看看。第一次見到北大，很是興奮激動。我覺得這個學校太大了，很怕自己迷路。因為我的行李還沒有寄到，那天晚上我就只能在 27 齋的一塊木板上將就睡了一晚。結果着涼了，半夜就發起高燒。可是人生地不熟，在北京我一個人也不認識，只能硬撐。好不容易捱到第二天，遇到歷史學系一位高年級的同學才知

道，原來是報到的時間推遲了。那位學長看我的字寫得還可以，就讓我幫他抄文稿。於是，在等待報到的日子裡，我就每天到歷史學系辦公室給他們抄文稿，抄的都是北大學長寫的文章。我看見書架上放了許多線裝書，邊抄邊想，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學問太大了，文章寫得真好。抄着抄着，我和一些高年級的同學就熟了。聽他們說起考古專業，覺得很神秘。有同學告訴我考古很好玩，可以經常到野外去遊山玩水。對人生懵懵懂懂的我，其實還沒有甚麼遠大志向，只是希望未來不要整天抱着書本。如果考古真像他們說的那樣，那不正是我想選擇的專業嗎？能夠飽讀詩書，還能遊遍名山大川，這自然是天底下最有趣的事了。

我在上海讀中學時，受父親的影響，特別喜歡到博物館看文物展覽，知道許多精美的文物都是經過考古發掘出土的。所以，我對考古專業充滿遐想，覺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入學不久就要分專業，我不假思索就報了考古專業。現在想起來，其實我對考古工作究竟要幹甚麼是一無所知，後來才知道其實並沒有多少人願意去學考古，因為太苦了。我就這樣稀里糊塗地選擇了考古專業。

兼容並包的學術風氣

1958年我入學之際，全國正在開展「大躍進」運動，北京大學也在開展「雙反」運動，進行教學改革。我所仰慕的張政烺先生被調離了北大，馬寅初校長也遭到了批判。

令我感到幸運的是，在教學改革的風潮中，北大的很多師長依然堅持一絲不苟的教學，依然有同學照常勤奮學習。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北大特殊的學習氛圍，感受到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傳統和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學風。我記得歷史學系當時還建立了統一的圖書室和閱覽室，經過 1959 年到 1961 年的逐步擴充，資料室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規模，給師生的教學科研帶來極大的便利。後來歷史學系還協助中文系籌辦了「古典文獻專業」，設置這個專業的目的是培養整理古典文學、史學、哲學方面文獻的人才。

雖然有這樣那樣的運動，但是整個 50 年代北大的校園氛圍中，洋溢着為共和國現代化建設而奉獻的熱情，幾乎所有年輕人都毫不懷疑地相信，一個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時代正在走來。在這樣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裡，刻苦學習、努力成為國家所需要的人才，是當時北大學子共同的理想。

我記得當時在上海的街上已經沒有多少人穿打補丁的衣服了，但是北大有不少學生的衣服上還打着補丁。當時大學生的生活條件普遍比較艱苦，但大家也沒有苦的感覺，普遍比較樂觀和積極。艱苦的生活條件沒有影響到北大學生的學習熱情，圖書館裡總是人滿為患，晚到的同學根本沒有位子。有時候圖書館門前還會排起長龍，等到門一開，同學們就蜂擁而入搶佔座位。後來因為圖書館的座位實在滿足不了所有想讀書的學生，只能實行分配制度。圖書館給各系各班分配了座位號，拿不到號的同學只能站着讀書。這就是那時候的學習氛圍。每個人的糧食也有定量，

食堂的甲菜是一角，乙菜是八分，都是葷菜；丙菜六分，丁菜四分，沒有肉，全是素的。剛到北方，吃慣了米飯的我，一開始不習慣吃麵食。當時一個大學生每月生活費也就十來塊錢，戴得起手錶的學生很少。如果某個同學戴着手錶，大家就說他是「有錶階級」。

入校之後，我們 58 級學生因分專業早，參加田野考古機會較多。我們 1959 年參加陝西省華縣發掘工地的「認識實習」；1960 年參加懷柔搶救性發掘；1961 年參加正式的生產實習——昌平縣雪山發掘，發掘了雪山文化遺址，還發現了西周燕國墓葬、漢代墓葬和遼代居住遺址。這麼多實習機會給了我們這些學生很好的鍛煉。1961 年到 1962 年新開的專業課是舊石器時代考古和新石器時代考古，分別由呂遵誥和嚴文明兩位老師講授；1962 年到 1963 年新開的專業課是秦漢考古，由俞偉超老師講授。

50 年代的北大學生內心充滿了對知識的渴求，當時有不少專家名人來北大講演，大大激發了學生們學習和創作的熱情。蘇聯作家波列伏依、卡達耶夫，印度作家庫瑪爾，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蘇聯電影大師邦達爾丘克，還有我國學者李健吾、陸侃如、劉大傑、吳祖光，相聲大師侯寶林，電影演員趙丹、白楊、黃宗英、孫道臨等，都曾經到北大與學生們交流。^{〔1〕}

我對藝術是發自內心的喜歡。有一次我們幾個同學一起去王府井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看《雷雨》，當時要坐 332 路公交車到動物園站，再坐 103 路電車到北京人藝。我們從劇院回來時錯過了最

晚的班車，於是就三五成群地唱着歌，從王府井一路走回校園，到學校時已是凌晨四點了。這樣的精神恐怕只能出現在那個年代。當時的北大人就有那樣一種朝氣和熱情。

在去北大的前夕，父親曾和我有過一次長談。父親說：「你考上了北大，未來的人生將會是另外的一個天地，你將會有更加廣闊的視野。」果然，我一到北大，就不斷聽周圍的人說北大有多少名師，有多少圖書，北大過去出過多少人才。這確實是一個學術的聖地。

50年代的北大，有一批出色的教授。歷史學系大家雲集，其他系也是一樣，比如中文系有著名的「三巨頭」：吳組緝先生、林庚先生、王瑤先生。三位先生在為人處世、治學方法各方面都各有特點。學生可以同時接觸不同治學風格的老師，最大限度地吸取不同老師的長處。學生在主要受某個教授的影響的同時，又可以吸收其他教授的長處，這是一種有利於培養人才的健全的教學格局與學術生態。

文理交融、兼容並包的學術風氣也是北大精神傳統中重要的方面。在北大的學術傳統中，一直有着繼承全人類所有文化遺產的眼光和氣魄。對於多元的中國文化，對於新的現代文化，對於西方文化，都鼓勵學生培養一種開闊的世界視野。北大的精神傳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追求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考，奮力開闢新的領域，投身國家和民族最為需要的事業。

群星燦爛的歷史學系

20 世紀 20 年代，以田野考古為標誌的近代考古學傳入我國。20 世紀中國檔案界「四大發現」，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經洞文書、北京故宮內閣大庫檔案、居延漢簡的發現，推動了國內的許多學者加入近代考古學研究的行列。利用考古學重建中國古代史的學術體系，這是現代中國考古學的開端。

早在 1922 年，北京大學就在研究所國學門（後改名為文科研究所）成立了以馬衡先生為主任的考古學研究室。1934 年後，由胡適兼任考古學研究室主任。1946 年，又成立了以向達先生為主任的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聘請梁思永、裴文中先生為導師，開始招收研究生。

1952 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部署，全國高等院校進行了院系調整。調整後的北大史學系也隨校從城內沙灘遷到西郊燕園，組成新的機構，名稱由原來的史學系改為歷史學系。調整後的歷史學系有原屬北大的教師，也有清華和燕京大學併入的教師。過去北大、清華、燕京三足鼎立，50 年代後就融為一體了。翦伯贊先生擔任系主任，他在三校融合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鄧廣銘先生就稱讚他能夠巧妙地把三校歷史學的老師團結起來，通力合作，消除門戶之見。新的歷史學系集聚了一群學術大家，除了翦伯贊、向達等先生，還有楊人楩、齊思和、鄧廣銘、邵循正、周一良、王鐵崖、蘇秉琦、張政烺、鄧之誠等海內外知名的學者。^{〔2〕}

院系大調整期間，在文化部和中國科學院的積極支持下，為搶救全國各地大規模建設工程中所發現的文物，培養考古文物工作人員，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設立了考古專門化教研室，把考古所、北大和文物圖書三部分力量集中起來，連續辦了四期考古學培訓班。這件事情由蘇秉琦等先生發起，後來由鄭振鐸出面，郭沫若牽頭，由北大作為主辦單位，負責頒發聘書和畢業證書。培訓班的授課教師都是當時歷史和考古領域的大家。郭沫若講奴隸社會史，尹達講原始社會史，翦伯贊講封建社會史，裴文中講舊石器考古學。四期考古學培訓班奠定了後來考古學學科教學和人才培養的基礎。^[3]

1952年，北京大學正式將考古學學科專門化，設立考古專業。當時的考古專業設在歷史學系，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蘇秉琦先生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請鄭振鐸、裴文中、夏鼐、梁思永、林耀華、郭寶鈞諸先生兼任教授。原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北京大學博物館以及燕京大學史前博物館合併成為考古教研室文物陳列室。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是新中國的首個考古專業。^[4]北大正式成立考古系是在1983年，由北京大學校長辦公會議決定，考古專業從歷史學系分出，獨立建系，由宿白先生擔任考古系首任系主任。

50年代的北大歷史學系，雲集了當時頂尖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當時給我們這個班授課的師長，都是我國歷史、考古學界的一流學者，如周一良、張政烺、田餘慶、商鴻達、張廣達、蘇秉琦、宿白等先生。我比較熟悉的是給我們考古專業學生講授考

後 記





樊錦詩與顧春芳合影

這本書完稿之後，一直沒有合適的書名，想了很多名字，都不合適。

2019 年春天，我和樊錦詩老師在燕南園和出版社的幾位編輯商定書名和版式。為了打開思路，編輯找來了許多人物傳記。

我看着身邊瘦小的樊老師，想到我們朝夕相處的日日夜夜，想到她神情疲憊、手不釋卷的樣子，想到四年前在莫高窟送別我的那個身影，耳邊始終迴響着她說過的那句話：「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來。」

這本書的終篇是「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我明白她的心。

宕泉河邊安葬着包括常書鴻、段文傑先生在內的二十七人，他們是第一代堅守敦煌的莫高窟人。這個墓地很隱蔽，在遠處幾乎看不見。這些人來自五湖四海，最終心歸敦煌……如有神明授意的那樣，我脫口而出：「心歸何處？書名就叫《我心歸處是敦煌》吧！」大家沉默下來，接着是讚許。樊老師看着我說：「嗯，還是你懂我！」

2014 年夏天，我初到敦煌，也初見樊錦詩。那次會面，匆匆而別，我沒有想到命運會在我們倆之間安排下如此深厚的緣分 and 情誼，我會成為這個世界上「懂她的人」，她也成為這個世界上

「懂我的人」。那年暑假，北京大學藝術學院的幾位老師到莫高窟考察，樊老師親自接待了我們這群北大校友，不僅安排我們參觀洞窟，還安排我們和敦煌研究院的專家進行了座談。記得那次座談會就在敦煌研究院的小會議廳舉行，那是我第一次面對面聽樊老師講述敦煌研究院的歷史，以及壁畫保護和傳承的艱辛，也是我第一次被「莫高窟人」堅守大漠、甘於奉獻的精神深深觸動。

臨別之際，她對我們說：「這次你們在敦煌的時間比較短，沒有看好。期待你們下一次再來敦煌，在這裡住上一段時間，這樣就可以慢慢看。有時間的話還可以去榆林窟看看。」

從 2014—2016 年，樊老師多次向我們發出邀請。那段時間，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中心正在策劃人文學的書系，計劃訪談一些能夠代表時代精神、代表中國當代人文精神的學者，出版一系列書籍。當我們和樊老師交流這個想法時，她很快就答應接受我們的訪談。2016 年暑假，我們再次赴敦煌考察。此行的任務有兩項，一是深入研究敦煌藝術，二是完成對樊老師的訪談。

從 2016 年 6 月 25 日到 7 月 5 日，我們在莫高窟和榆林窟考察了整整十天。

二

莫高窟的清淨令人心生敬畏。

許多洞窟都有着沿牆角一字排開的禪修窟，這是數千年來歷代僧侶在此禪修的明證。如今人去窟空，對於頗有悟性和慧根

的人而言，目擊空空的禪窟或有如棒喝一樣的啟示。即便不能頓悟，眼前也一定會浮現當年那些枯瘦如柴的禪僧，在陰暗寒冷的洞子裡默坐冥想的情景，心中必定生出一種謙恭和敬意。在莫高窟，那一尊尊苦修佛並不是虛假的幻想，而是一種日常的真實。

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人時時讓我想起出家人。他們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付給敦煌的流沙和千佛洞方圓百里上匆匆消逝的光影，在一種貌似荒寒的人生景致中等待一個又一個莫高窟的春天。他們雖然不唸經、不拜佛，但是臨摹壁畫、修復洞窟、保護遺址、宣傳講解，這些日常生活在我看來無異於出家人的修行。

莫高窟是一種考驗，只有那些最終經受住考驗的人才能修得正果。

夏夜的傍晚，太陽還沒有落下時，莫高窟上空明澈無比的藍天令人陶醉。遊客散去之後，位於鳴沙山東麓、宕泉河西岸的莫高窟就顯得格外神聖。那些開鑿在長長的石壁上，如蜂房一般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蔚為壯觀，那看似灰頭土臉的外表下隱藏着聖潔而又神秘的偉大文明。走近石窟，就能強烈地感覺到每一個洞窟透出五彩斑斕的神光。

敦煌日照時間長，特別是夏天，晚上九十點鐘天還是亮的。白天我們按年代參觀洞窟，晚上我們就天南海北地聊天。每天傍晚六點左右，樊老師就會準時來到莫高山莊。七月的敦煌，正是「李廣杏」成熟的季節。每次她來的時候，手裡都會提上一袋子洗好的「李廣杏」。這是敦煌才有的水果，是她特意在當地農民那裡買來的。據說每年只有這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在敦煌品嚐到這種

格外美味的黃杏。

為了這個訪談，我擬出了一百多個問題。但真正進入訪談，我擬出的題目基本失效。她的健談，她閱歷的豐富，思路的開闊，還有那些從來不為人知的往事，遠遠超出我的預想，似乎每一個小問題都可以打開她記憶的寶藏。樊老師的講述有她自然內在的邏輯，只需一點觸發便能源源不斷地噴湧而出。而我要做的就是把她所說的話全部記錄下來。近六十年的敦煌生活，她對那裡的每一寸土、每一棵樹、每一方壁畫都如此熟悉，從莫高窟的歷史、洞窟壁畫藝術到考古保護工作的方方面面，她都如數家珍。

我們每天平均採訪三到四個小時，最多的時候，樊老師一口氣說了五個小時。我邊聽邊做筆記，以最快的速度記錄談話內容，以便後期整理。我負責提問和記錄，董書海博士負責錄音。十天後，當我們離開敦煌時，已經積累了將近二十萬字的訪談稿。

樊老師有每晚散步的習慣。她最喜歡從家裡走到九層樓，聽聽懸在檐下的鈴鐸，聽聽晚風掠過白楊的聲音，然後在滿天繁星升起之時，踩着月光，散步回家。離開敦煌前的一天晚上，她提議大家一起散步去九層樓。

散步的時候她告訴我，沿着道路兩旁的是銀白楊，因為起風時會發出噼哩啪啦的聲音，當地人管這種樹叫「鬼拍掌」。冬天的時候，樹葉落光，枝幹直指藍天，就更加氣宇軒昂了。那是我第一次眼睜睜看着夜晚的寂靜緩緩降臨，那是一種無邊無際的寂寞覆蓋下來的感覺。遠處是宕泉河，再遠處是宕泉河河谷地

帶星星點點的綠洲，綠洲的外面是戈壁，戈壁的再遠處是人跡罕至的荒野和山脈。人在這樣的地方，就好像墜入了一個無盡的時空深淵，有一種無助感和失落感。她說，過去有位前輩對她說過一句話，要想在莫高窟生活，首要的功夫是要耐得住這裡的寂寞。

也是在那天晚上，她對我說，大家都認為她留在敦煌是自己選擇的，其實她有幾次想過離開敦煌。我問她：「最後為甚麼留下來？」她說：「這是一個人的命。」鳩摩羅什當年隨呂光滯留涼州達十七年，也是一種並非自己選擇的情形下開始佛法的弘揚，而樊錦詩是隨歷史與命運的風浪流徙至此。不同的是鳩摩羅什當年是東去長安，後來在「草堂寺」負責佛經的翻譯工作；而樊錦詩是西來敦煌，在「莫高窟」守護人類的神聖遺產。好在有彭金章這匹「天馬」，在她最艱難的時候，「伴她西行」，不離不棄，陪伴左右，和她一起守護千年莫高，一直到他生命的終點。

夜幕降臨時，九層樓的四周愈發安靜，安靜得彷彿都能聽到彼此的心跳。我們的耳畔是隨風傳來的一陣陣叮叮噹噹的鈴聲，斷斷續續，若隱若現，似有若無……樊老師說那是九層樓的鈴鐸。鈴鐸的聲音躍動在黑夜和白天交替之際，讓人感到彷彿遊走在變幻莫測的夢境。直到滿天星斗閃耀在我們的頭頂，微風從耳際拂過，那壁畫裡飛天彈奏的音樂也好像瀰漫在我們的周圍……

我突然明白了樊錦詩願意一輩子留在敦煌的原因了。塵世間人們苦苦追求心靈的安頓，在這裡無需尋找。只要九層樓的鈴鐸響起，世界就安靜了，時間就停止了，永恆就在此刻。

三

我把錄音和訪談稿帶回了北京，很快就整理出了文字稿。

從內容來看，這已經具備做成一個訪談錄或口述史的基礎。但口述文字要落實到書面，存在一些顯而易見的問題。第一，訪談涉及的問題比較分散，需要條分縷析、理出層次、分出章節；第二，關於壁畫藝術、石窟考古、遺產保護等許多具體的例子只是口頭提到，年代、數據、事件的詳細經過在口述過程中無法做到完全準確和翔實，有些問題只是點到為止，需要事後一一查實補充；第三，談話中有的內容比較充分，有些內容比較單薄，需要事後翻閱資料、查漏補缺；此外，口頭表達避免不了口語化，而其中涉及的敦煌歷史、敦煌藝術、敦煌學、考古學以及遺產保護等問題卻是專業性、學術性極強的話題，必須確保知識性的內容準確無誤……如此一來，我深感訪談的稿件離最終成書距離遙遠。究竟如何來處理這二十萬字的採訪稿，成了我面臨的一個難題。

我把口述的內容整理出十三個部分，分別涵蓋了童年、大學、實習、歷史、學術、劫難、至愛、藝術、保護、管理、搶救、考古報告和莫高精神，這就是這本書十三章的最初框架結構。這個框架不僅包含了樊錦詩的個人命運、人生經歷，還涉及敦煌的歷史、藝術、學術以及敦煌保護管理等各方面的問題。但是，我不能確定樊老師是否同意這樣的框架。當我忐忑不安地給她看全書的框架設計時，她的話讓我心中的這塊石頭落了地。她

說：「我很贊同你的設想。我沒有甚麼傳奇故事，我的人生意義正是和敦煌聯繫在一起的，我和敦煌是不可分的。我樊錦詩個人的經歷應該和具體的時代聯繫在一起，你的想法也是我所希望的。」

然而，這本書是一次跨度極大的多學科嘗試。寫樊錦詩和敦煌，涉及敦煌藝術、敦煌學、考古學、文物保護等多個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學科領域，還有歷史學、宗教學，以及關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各種文明和敦煌之間的交融互動……對我個人而言是個挑戰。

完成此書，除了跨學科的難度之外，還有各章內容的不平衡，有的充實，有的薄弱，有些章節內容只有數千字。怎麼辦？樊老師遠在敦煌，我在北京，不可能每天和她通電話，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問題全部拋給她，畢竟她重任在身，不能因為這本書佔用她全部的時間。並且大多數寫作中遇到的問題是無法通過電話採訪解決的，必須查閱相關資料，才能加以豐富和充實。

我找來了樊老師全部的著作、論文以及講演，希望可以把它以往她曾經思考過的重要問題融入她個人的傳記。通過閱讀她所有的文章，我理清了她在學術上始終關切的核心問題，在敦煌學研究上已經或試圖突破的問題，在遺產保護方面主要抓住的問題，以及她在時代轉型時把握的重大問題。直到我對她的學術思想、思維方式、表達方式越來越熟悉。書中有的地方或許她只是說到幾句話，提到曾經發生的一件小事，但在我看來很重要，我就進一步查找相關資料，儘量恢復她自己也已經淡忘的那些往事。我在寫這些往事的時候，就好像聽到她本人在我耳邊敘述。這些文

字不像是我寫出來的，而像是她以特有的語氣、思路和節奏說給我聽的。

比如樊老師回憶蘇秉琦先生，她只是簡單提到畢業之際蘇先生找她去朗潤園談話的往事，至於談了甚麼，為甚麼找她談話，這些記憶都已經非常模糊了。如何從歷史角度來把握蘇秉琦和樊錦詩的這一次談話，如何寫好蘇秉琦先生？我需要重新學習蘇秉琦先生的考古報告和考古思想，並為此翻看了蘇秉琦先生長子蘇愷之撰寫的《我的父親蘇秉琦：一個考古學家和他的時代》。我覺得只有在自己的意識中復活一個活生生的蘇秉琦，才能真正理解並懂得蘇先生為甚麼要找樊錦詩做一次談話。僅僅這一章，我就需要對蘇秉琦先生考古學的研究成果、他對中國考古學的貢獻、他的考古學理念、他何以成為考古大家等諸多方面進行必要的研究。沒想到，樊老師看到這一章時非常感動，她說：「謝謝你！我以前覺得蘇先生很了不起，現在我更加覺得蘇先生了不起，我的一生能有這樣的老師真是幸運！」

為了更好地了解 1958 年樊老師入學時候的北大，幫助她回憶起當時的真實情況，我們還特意去北京大學檔案館借出了樊錦詩在校期間的學籍卡以及各門功課的成績，查看了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和考古系的相關歷史檔案，查閱了 1958 年左右入學的北大校友的回憶錄，力求真實地再現樊老師大學期間每個學期的課程學習、下工廠勞動、食堂伙食等情況，力求還原樊錦詩在北大求學的那段生活。當我把那些檔案複印給她的時候，她驚喜地說：「這些資料你都是從哪兒挖出來的？」

此外，關於她如何度過最艱難的歲月，從哪裡汲取精神動力，一直是我反覆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沒有任何資料可考，需要我自己用心去探尋。樊老師最喜歡第 259 窟的禪定佛和第 158 窟的涅槃佛，她心靈的答案就藏在這些偉大藝術之中。當我介紹敦煌的壁畫和雕塑時，不是從陳述敦煌藝術知識的角度來講敦煌，而是從存在的角度體悟樊錦詩和敦煌藝術之間的生命關聯，這需要我闡釋敦煌藝術的意義，敦煌藝術如何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了樊錦詩的整個生命。在這個過程中，我的藝術學理論的專業積累，我的藝術闡釋學的學術思考，幫助我完成了這項難度最大的工作。

比如談第 158 窟的涅槃佛。「涅槃」最難談清楚，樊錦詩所領悟的「涅槃真意」很難談清楚。樊老師對這個洞窟情有獨鍾，我就要闡明她何以對這個洞窟情有獨鍾，在她最痛苦的時候為何喜歡去這個洞窟看看，這尊涅槃佛究竟給予她甚麼啟示？這一節寫出之後，我發給了樊老師，她很快就給我回了電話，電話裡說：「顧老師，你這一章我給我的兒子看了，我的兒子回了我一句話，他說：『媽媽，你這本書交給她寫沒有錯，這位顧老師真下功夫。』」

這本書也不僅是樊錦詩個人的傳記，書的內容涉及對幾代敦煌人的回憶，這既是樊錦詩個人的奮鬥史，也照應着敦煌研究院的發展史，是守望莫高窟的一份歷史見證。第一，樊錦詩現階段的思考，遺產保護在未來所要面對的嚴峻問題，都在這本書裡得到了真實的呈現。第二，樊錦詩是第一個做出了莫高窟考古報告

的人。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說，《莫高窟第 266—275 窟考古報告》作為中國考古學的當代成果，意義重大。樊錦詩在書中毫無保留地貢獻了她關於石窟寺考古的全部思想和觀念。第三，關於世界遺產的保護，如何在遺產保護過程中建設數字化保護工程？很多高科技的保護工作是如何一步步發展起來的？樊錦詩的回憶也具有檔案的價值。這一探索過程傾注了她畢生的心血，書中對此也進行了總結。

四

2017 年春天，彭金章老師查出晚期胰腺癌，這是不治之症，這件事猶如晴天霹靂。

樊老師本來希望能夠由她本人逐章校對書稿後再出版。但是由於彭老師在上海治療期間，樊老師心力交瘁，我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好意思再提出校對書稿的事情了。初稿完成後，出版的事就暫時擱置下來了。樊老師一邊陪護在彭老師身邊，一邊還要為敦煌的工作四處奔波。她當時已是一位八旬老人了，我們都非常擔心她的身體，每次通話我就在電話裡安慰她。那段時間我們幾乎每天都通電話，我感到她為彭老師的病情非常着急、痛苦和焦慮。她始終覺得自己對不起老彭，因為忙於工作，自己沒有盡到做妻子的責任，這一輩子老彭為自己、為這個家付出太多了。

他們夫婦最後一次來到北大，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天是 2016 年 9 月 8 日，北大人文學院的院長鄧小南教授（鄧廣銘先生的女

兒)請樊老師做關於敦煌保護的演講,樊、彭兩位老師共同參加了這次活動。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聆聽彭老師熱情洋溢的發言。他說起兩地分居的艱難,說起他引以為豪的敦煌北區考古發掘,說起和樊老師的愛情,「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說起自己無悔的一生……場面令人感動和難忘,那一天很多與會者都落淚了。那一次會後,他們倆一同去藍旗營看望宿白先生。

2017年7月29日,彭老師去世。葬禮異常樸素,她沒有驚動任何人。2018年2月1日,宿白先生也去世了。

2017年中秋節那天,我的手機上顯示了樊老師發來的一條短信,她說:「今天是中秋,我一個人在九層樓下散步,今天莫高窟的月亮非常圓,每逢佳節倍思親,我現在非常想念你……」當時我的眼淚就止不住往外湧。我知道痛失愛人的樊老師心裡,已經把我當成了自己的親人。我撥通了她的電話,聽到了九層樓夜晚的風聲,風中傳來她疲憊的、令人心疼的聲音。她說自己每天整理彭老師的遺物,一邊還整理了一些供我參考的研究材料和關於敦煌學的書,準備打包整理好寄給我。

我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對全書進行核對和修改,準備擇時與樊老師核對書稿。沒有想到的是2017年初,我父親確診為晚期肺癌,之後的一年我陷入了極度的忙亂和焦慮中。2018年7月,我父親去世,整整一年我無暇顧及其他事情。出版的時間一推再推。令我永遠難忘的是,從我父親生病到去世的這段時間,樊老師每隔兩三天就會來一個電話寬慰我、鼓勵我。她剛剛失去

了親愛的丈夫，而我失去了最疼愛我的父親，失去至親的悲傷可以想見。她在電話裡反覆勸我要想開，要往前看，我從她的安慰裡獲得力量和信心。2018 年大年三十，我知道樊老師一個人在敦煌過，沒有彭老師在一起過年，一定很孤單，便給她去了電話。她告訴我，她把老彭的照片放在餐桌前，她和老彭一起吃了年夜飯，她對老彭說：「老彭，晚上咱倆一起看春晚。」

2019 年 3 月，樊老師對我說：「顧老師，我想好了，我要到北京去住一段時間，我覺得我應該全力配合你校對書稿。」我知道她是心疼我太累了，但是我很擔心她是否抽得出時間，因為 2019 年初，她剛剛榮獲「改革先鋒」的稱號，有許多許多活動等着她參加。但是她執意要來北大和我一起修訂書稿，並且不讓我告訴任何人她在北京。就這樣，從 3 月到 6 月，我們先後躲在北大勺園和中關新園，朝夕相處，手不釋卷，除了吃飯，其餘時間都在核對書稿，終於把這本書一章一章地修改完畢。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感謝的人太多。王旭東院長多次前來探望，趙聲良院長和蘇伯民、張先堂兩位副院長參與了對部分章節的核對工作。趙聲良院長親自審閱書稿並提出重要建議；蘇伯民副院長就涉及石窟保護問題的第九、十章給出了專業性的建議；張先堂副院長為第五章內容提供了很多新的資料，並參與校對核實了第四、五、八章。董書海博士負責前期的會議和錄音；敦煌研究院的楊雪梅同志為此書提供了許多材料和照片；敦煌研究院的許強同志協助做了許多工作，他和馬翠芸同志還負責護送樊老師往來敦煌和北京；數字中心的吳健和孫志軍同志提供了珍貴的

照片，孫志軍同志還拍攝了封面照片。特別要感謝我的兩位學生王一哲和劉燦。王一哲負責安排落實樊老師在京校稿期間一切生活上的問題，在後期還協助查閱材料、核對書稿。劉燦協助我補錄和整理了部分章節的回憶內容，查找檔案和相關文獻資料。在此過程中，大家和樊老師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還要感謝樊老師的兩位兒子，他們是如此信任我，凡是我想了解的，對我知無不言，為我提供了許多材料，讓我了解到一個真實的母親和妻子。特別要感謝譯林出版社的顧愛彬社長和編輯團隊，給了我們極大的理解、寬容、信任和支持。

2019年5月28日完稿的那天，樊老師提出一定要做東請大家吃個飯。那天，她特意帶上她的錢包，請我們在北大「怡園」中餐廳吃了頓豐盛的午餐。

五

這本書前後寫了將近四年。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穫是樊老師對我的言傳身教。

這四年的時光有幸和樊老師在一起，從師生關係，到忘年之交，尤其是最後校對書稿的這段時間，我就好像跟着樊老師又讀了一期研究生。她把自己對於敦煌很多問題的思考毫無保留地告訴我，把關於人生的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我，讓我在這個過程中零距離地接近她、了解她、認識她，體會她最真實的內在心靈節奏和精神世界。

寫作這本書的過程，讓我真正走近樊錦詩，懂得樊錦詩。

她和雙胞胎姐姐六個半月就出生，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她得過小兒麻痺症，幾乎癱瘓，幸好沒有落下後遺症；她遭遇過青霉素過敏，死而復生；她經歷過父親的非正常死亡，經受過含冤受辱的日子；她也忍受過夫妻兩地分居十九年的艱難歲月……她能夠活下來，還能活出她希望於自己的那個樣子，做出一番令人動容的事業，是一個奇跡。她那兩條瘦弱的腿，從上海走到了北京，從北京走到了西北，去到了萬里之遙的敦煌，走過荒漠和戈壁，走過許多常人難以想像的坎坷和崎嶇，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樊錦詩是善於觀察、善於學習、善於自我約束的那種人。也許她在她父親那裡學會了謙虛和果敢，繼承了父親溫柔敦厚的文人氣質，以及在決定了任何事情之後，永不更改的決心；在母親那裡學到了安靜慈悲以及簡樸的生活方式；在她的老師蘇秉琦和宿白等先生那裡，她懂得個體作為社會的一員，應該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自己在社會和整個的人生中實現自己的價值，摒除任何矜驕之心；她也在敦煌的前輩那裡學會了意志的堅定，懂得了在任何時候都要學會堅持和隱忍，懂得了信賴自己的真心，懂得了要有大的作為，必定要經歷大的磨難，以艱苦求卓絕，在任何的艱難和痛苦中鎮定如常，如如不動。

而所有這些在她身上所體現的美德，都是她生命中所敬慕的那些人以人格的方式傳導給她的，每一位接觸樊錦詩的人都可以在她柔弱的軀體裡感受到一種至剛的力量，感覺到一種堅定、謙遜、溫和的精神氣質。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

溫，聽其言也厲。」（《論語·子張》）意思是說，君子的氣質有三種變化：遠望他的外表，很嚴肅；近距離接觸他，很溫和；聽他說話，很嚴厲。樊錦詩就是那種達到大道似水、至柔至剛、剛柔並濟的人。

她在人格方面，自有一種甜美、寧靜、淡然和尊嚴。正是這樣一種和諧呈現，讓我們看到她與她所從事和堅守的事業融為一體。她所在的地方就是敦煌，就是莫高窟，就是考古保護事業；而敦煌的所在就是她的所在，她的名字就代表着莫高窟。她選擇敦煌和莫高窟作為自己心靈的歸宿，敦煌和莫高窟選擇了樊錦詩向世人言說它的滄桑、寂寞、瑰麗和永恆。

也許當一個人真正了悟時，他的內心才會升起一種持續的歡樂和發自內心的喜悅，因為這是從心靈深處生發出一種迷惘的解脫和無惑的快樂，而這樣一種無惑的快樂是其他世俗意義上的快樂所無法比擬和超越的。古羅馬哲人塞涅卡說：「正是心智讓我們變得富有，在最蠻荒的曠野中，心智與我們一起流放，在找到維繫身體所需要的一切後，它飽嘗着對自己精神產品的享受。」

我在《樊錦詩和宿白的師生情緣》這篇文章裡，曾用「守一不移」四字來概括樊錦詩一生的追求和意義。這個「一」就是莫高窟，她來了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這個「一」是她作為北大人的自覺和自律，離開北大以後，一直在她身上傳承和保留了的北大精神；這個「一」還是知識分子的良知，她從沒有忘卻也沒有背叛過。所以，她的一生就是「守一不移」的覺悟的人生。唯有莫高窟的保護，才是她確證自己存在的最好方式和全部目的。用她自

己的話來講就是：躺下醒來都是莫高窟，就連夢中也是莫高窟。正是這種堅貞和執着，使她「飽嘗着對自己精神產品的享受」，在世人面前呈現為這樣的一個純粹的人。

樊錦詩沒有為自己的孩子們留下甚麼遺產，她捐出了所有個人獲得的獎金用於敦煌的保護。她從來不留戀美食和華服，不留戀金錢和名利。她穿衣只求舒適便可，一件結婚時候置辦的外套穿了四十多年，裡子全磨壞了也不捨得扔；吃飯必須餐餐光盤，不僅要求自己，也要求所有和她一起吃飯的人；酸奶喝完了，必須用清水把酸奶瓶涮乾淨，空瓶子帶回去當藥瓶子繼續用；酒店裡沒有用完的小肥皂，必須帶到下一個地方接着用；離開酒店的時候一定把裡裡外外打掃乾淨，她說這是對服務員的尊重……我曾問她：「你為甚麼這麼節省？」她說：「我經歷過困難的日子，覺得不應該鋪張浪費。但主要原因是父親去世之後，家裡很困難，母親和兩個弟弟都沒有工作，我的大部分工資都要寄回上海家裡，慢慢就養成了緊衣縮食的習慣。」

樊錦詩是過着最質樸的生活的那一類人。對於這樣質樸的人而言，質樸生活源自心靈最深處的自覺。她唯一感興趣的就是不斷向世界介紹她心愛的莫高窟，介紹她所從事的莫高窟保護事業，彷彿她人生的全部意義都是在這一件事情上面。能夠遇見這樣的人，並且與這樣的人行路和思考，是一種具有神聖意義的體驗。她好像習慣於把每一件事當成人生的最後一件事情去做，時刻履行在有限的人生中的責任，能夠完全控制並實現着自己的品質，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嚴格地塑造自己，成為自己真正的造物主。

在樊錦詩的身上，呈現着一種少有的氣質，單純中的深厚，寧靜中的高貴，深沉中的甜美。當我這樣感覺她的神氣的時候，我發現，這正是我面對敦煌壁畫時候的關於美的體驗。壁畫穿越歷史的美，那種滄桑中的清雅和燦爛，在這裡以一種奇妙的方式滲透在一個人的氣度之中。她的高貴來自她思想的嚴肅、莊重和純正；而那種深沉也許來自長年的關於文物保護的憂思，來自她對於莫高窟這一人類絕無僅有的寶庫的現在和未來的強烈責任；而她的童真，年屆八十卻依然如少女一般純真的笑容，是偉大的藝術和神聖的使命所賦予她的那種安寧和靜謐的心靈所造就的。

她一生的成就都源自她的心，她一生最高的成就就是她的心！

顧春芳

2019年8月於北京大學燕南園